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 古今通论
- 古代通论
- 世界史论
- 当代三农
- 现实问题
-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 先秦通论
- 原始经济
- 文明起源
- 夏商西周
-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 汉唐通论
- 战国秦汉
- 秦国秦代
- 西汉东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 宋元通论
- 唐宋通论
- 北宋南宋
- 辽金西夏
-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 明清通论
- 明代通论
- 明中后期
- 清代通论
-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清代晚期
- 民国通论
- 民国初年
- 国民政府
-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 近世通论
- 现代通论
- 前十七年
- 文革时期
-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 学科发展
- 专题述评
- 年度述评
- 学人学术
-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 史观史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史料索引 / 古今文献 / 关于整理祖国农业学术遗产问题的初步意见*

关于整理祖国农业学术遗产问题的初步意见*

2006-01-18 王毓瑚 载《王毓瑚论文集》 点击: 509

关于整理祖国农业学术遗产问题的初步意见*

关于整理祖国农业学术遗产问题的初步意见*

王毓瑚

载《王毓瑚论文集》

一、引言

农业部前苏联顾问卢森科同志曾说过：“中国的农业技术人员应该创造一套新的、中国的农业技术。”关于“新的”可不必说。至于农业技术前面冠以“中国的”字样，应该这样理解：即农业生物科学原理虽然是一般性的，但具体到一定地点、一定环境里的农业生产的时候，对于同一事物的处理方法和技术则颇不相同。换言之，在各种实用性的科学当中，农业科学是属于地域性比较强的一类。如果要讲理论联系实际，似乎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更是必需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也同其他一切真正的知识一样是从生产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我国是一个农业古国，数千年来自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现在要在联系本国实际的原则之下来学习外国的先进农业学术。而所谓本国实践，也应当包括总结过去本国原有的农业学术在内。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教条主义的错误。正是根据这个观点，现在来谈谈整理祖国农业学术遗产问题。

二、对于我国传统农业的一些认识

我国过去号称“以农立国”，这句话包含着一种意思，即本 *本文系1955年1月18日在北京西郊罗道庄北京农业大学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的报告，刊于《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55年10月1卷1期。国所需的生活资料，特别是食料，基本上一向是凭自给的。这是与从来就是依赖输入的欧洲各国完全不同。我国居民众多，也是自古已然。两汉末年，只“注籍”的人口已经接近6 000万人，实际的数目当然更大，大约同十四五世纪全欧洲的居民相等。居民多也就是对食料的需要大。既然没有输入可以依恃，这一沉重的供应任务自然完全由本国农民承担起来。在这里还应计算到，由于种种原因，历来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并不是像一般所想像的那样多。历代的政论家们常常谈到“游食者众”，话虽不免多少夸大，但也多少反映了这方面的现实。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相对地少，也就是每个生产者必须生产出来更多的农产品。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农民，就不得不想尽方法来增加生产，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之所以发达的较早，主要的原因也许就在于此。比起欧洲各国来，我们的农业摆脱真正的休耕制要早多少个世纪。与此相应，使用肥料，特别是有机肥，在我国也开始的较早。公元以前，我们的农学家已经发明出来精密的“代田法”，对于作物轮栽也有了初步的认识，这些都是很好的证明。

一般说来，两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发展是缓慢的。农业方面也似乎没有什么进步。这在一定程度内也是不容否认的。例如现在农民所使用的农具，仍然是相当原始的。写成于14世纪的王祜《农书》，甚至17世纪的《农政全书》，其中许多地方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还是因袭6世纪时人所著的《齐民要术》。不过进步的缓慢是相对的，就是说，如果考虑到古代所已达到的水平以及两千年这样悠长的时间，这样的进展是不能算快。进步缓慢的原因主要是在生产关系方面，这里抛开不谈。但如果进一步来观察，就要承认，绝对的进步仍然是相当显著的。在这里只需想到我们的农作物和园艺作物的品种是不断地在增多，多少外来的品种经过风土驯化，在我国境内繁殖起来。许许多多的操作方法也都常有改进。试以嫁接为例。这种方法，我国的农学家知道的很早，以后不断获得丰富与提高。14世纪末期人所著的“种树书”中，记载着种种有趣的植物嫁接。17世纪中王象晋的《群芳谱》里面，又谈到嫁接与培育相结合来促成变异的办法。《花镜》的作者更进一步肯定了嫁接在改变植物性状上的多方面的效果。特别值得提起的是水利田的开发。长江以南各地主要是水田区，生产效率也是比较高的。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当中，我们的农民创造出来种种因地制宜的水田制度，如太湖区域的圩田或围田，洞庭湖一带的垸田等等，更不必说各地普遍存在的梯田。这种耕作制度的共同特点是就地取材，代价低而效果大，并且是将开发水利同防治水患二者巧妙地结合了起来。这些成就体现着多少世代农民的劳动与智慧的积累。在我们的历史上，全国的经济重心是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水田区域成为全国的谷仓，因而灌溉也就成为我国传统农业的一个特点。而水田的经营技术的发展，就时代来说是比较靠后的。因此应当承认，我们的农业技术很早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后来还是续有改进的。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就必须设法增大农业经营的集约度。但由于种种原因，生产资料方面的增加是有限的，因此我国农业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是所谓“劳力集约”。这里包括了体力和脑力两个方面在内。除了劳动的强度提高不谈而外，特别是在操作方法和技巧方面，历代农民是不断地在开动脑筋找窍门，发明创造。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有无数的特殊方法和技巧产生出来。也同各种手工业者一样，我们的农民拥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秘诀”，像最近大家传说的白菜中间夹种韭菜可以防病的方法，就是一个例子。又如稻农插秧的技巧，也是令人惊异的。这些技巧和“秘诀”在农民中间世代相传，并且时有改进。

说到这里，就要连带指出，中国农民并不像过去某些人说的那样本性保守。不是的。说我们的农民本性保守，就如同说他们喜静而不喜动同样是似是而非之谈。由于任务的沉重，我们的农民不能不经常呕尽心血，设法提高生产效率。他们不敢轻于试用新的方法，只是由于恐怕试验不成功生活没有保障的缘故。在可能范围之内，他们还是积极地讲求推陈出新的。农民是如此，研究农业生产的学者们也是如此。历代学者对于同一题材曾写成了许多的书，这就证明后来的人对于前代人的说法有所阐发、提高和补充。例如关于“区种法”，历代学者多曾提倡，有的亲自实验，就原来的形式加以变通和改进，并极力主张推广。再如《农政全书》作者徐光启提倡北方植棉，清代的杨岫主张关中可以植桑育蚕，都是反复陈说，力排俗见。至于栽培果树、花卉方面的例子，更是俯拾即是。在着手整理祖国农业遗产时，首先似应抛弃中国农民本性保守、中国农业学术在历史上并无进步等等的想法，否则自然会引出祖国农业遗产并无足观的结论来，那是对于整理遗产的工作会发生不良的影响的。

我国原有的农业学术是从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因而也说是同实际相结合的。保存在农民中间的部分是如此，写在书上的，基本上也是如此。撰写农书的人，动机大都是实用，所以书的内容多半相当切实。就连关于果树、花卉一类的著作，也多半是作者本人亲自从事培育、观察、研究的记录。只是在理论上，由于我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基本上是在汉代所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学也不例外，而汉人的学术思想又是披了阴阳五行的外衣的，因此，特别是比较早期的农书当中，颇杂有阴阳五行的气息。公认为颇具科学价值的《齐民要术》，就引录了许多这种性质的古书。我们不应因此而对于这类的书整个加以否定，而是要揭开其神秘的外衣，而抓住其中有价值的部分。阴阳五行的“理论”含有一种朴素的辩证观念。这种朴素的辩证法虽然还不是科学的，但究竟是具有一定的正确内容。而且这种气息事实上逐渐在减退，如明清两代的农学著述，很多已是趋向于现代科学的方向。对于这中间的发展过程加以研究，无疑地也应当是全部整理祖国农学遗产工作当中重要的一项。

三、旧有农学文献概况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发展起来一种农本主义。历代的统治者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始终标榜“重农”。在这一基本原则的影响下，一般知识分子也都知道重视农业，因而对于同样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也总是另眼看待。他们当中也确有不少是中、小农民出身，农业生产对于他们并不陌生，有的更是认真加以研究，并从事这方面的撰述。不管农本主义的实质如何，这一事实是重要的。原因是一般直接从事生产的农民在重重压榨之下，没有条件把关于农业生产的知识和技术记录下来。这种工作是要知识分子来做的。正是因为历来的知识分子知道重视农业生产，所以才有很多的农书著成。

我国历代写成的属于广义的农业(包括农艺、园艺、畜牧、兽医、水产等方面)的书籍，只算生产理论和技术性质的专著，据初步统计，接近500种。这个数目确是可观。这些著作的篇幅大小不一，大的有几十卷，甚至百卷以上，小的只是一篇短文。各书的科学价值也自然极不一致。从书的内容来分析，除去专讲耕作、溉灌、农业气象等等著作而外，以蚕桑和茶为对象的占到一个不小的比重。这自然是容易理解的。此外属于园艺学范围的也很多，而这些园艺书籍当中，大部分又是以果树和花卉为对象。虽然这种著作多半是文人们的遣兴之作，但因为确是基于细心的观察和实践，还是具有一定的科学内容的。关于蔬菜方面的专书比较少，可是很有几种专门讲野菜的书，很值得注意。野菜当中很多是颇富有营养价值，在这方面很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使我们的菜蔬供应来源更加丰富起来。畜牧在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当中所占的比重原是很有限的一，因此这方面的著作也比较少，而其中大部分又是讲马的。马在我国过去虽然并不是主要的耕畜，但历代政府为了军事上的需要，不能不讲求“马政”，因而也就不断有专人研究相马和医马。历来通行的所谓马经，很多都是政府方面编撰的。不过这方面的书完全是实用的性质，总是前后因袭，在旧书的基础上不断进行修订删补。这从各书的题名极相近似一点上可以看得出来。例如北宋有一种《安骥集》，南宋又有《司牧安骥集》和《司牧安骥方》，元代有《马经通元方论》，或作《司牧马经痊骥通元论》，后来又有《痊骥集》和《痊骥真经》。这些书大约在内容上是有许多部分相同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往往是后出来的行世之后，原有的就很少有人再去阅读或传刻，因而易于失传。同时一般藏书家对于这类的书也不像对于经史之类的书籍那样重视，不过是遇到就收，聊备一格，未必特意搜求，所以保留到现在的为数极少。至于水产方面，虽然也陆续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专门的著作却不多。这似应归因于过去的知识分子所重视的农业过于偏在耕织的方面。除了上面所说的专门著作之外，还有很多有关农业生产的记述，散见于各种不同性质的书籍当中。其中也颇有内容极为重要的，在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时，必须加以参考。例如《管子》中的“地员篇”，是一篇很值得重视的关于土壤的文字。《吕氏春秋》中的“任地”、“辨土”、“审时”等篇，也是保留下来的先秦时期的人关于耕作、土壤等等的认识的记录。《亢仓子》是道家的书，但其中的“农道篇”谈到耕种方法，虽然简短，还很值得一读。清代杨岫的《知本提纲》原是发挥儒家传统的大道理的一部书，内容大都为迂腐之谈；但其中有关于耕牧的部分，仍然是很朴素的关于农业生产方法的论述。至如各种笔记、小说、杂记一类的书中，也可找到相当重要的有关资料。例如北宋蔡绦的《铁围山丛谈》里面记载着当时汴京皇家花园里种的有荔枝和椰子树，而且结实。这应当是会引起园艺栽培专家们的注意来的。

更有若干辞典性质的书，除了专门解释农业名辞如《农雅》、《九谷考》、《释谷》、《农具考》之类而外，像《尔雅》、《广雅》、《埤雅》、《通雅》等等，其中也都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部分。为了解释一个名辞，往往搜集了很多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原是散在各书，其中有的已经失传，有的也并不易见到，因此这类属于第二手性质的书也是研究中国农业的发展所需要的。一些类书的情形也与此相仿。

还应指出，各种地方志当中也包含着有大量有关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料。单就作物品种一项来说，各种志书里记载的就极为详细。这种资料是别的书里面见不到的，因此也是珍贵的。

附带着补充一点。在利用旧有文献时，必须注意辨别真伪。我们要研究的是农业生产知识的发展，这自然首先要确定文献产生的时代的前后。但我们旧有的书籍有的可以肯定是后人假作的。像前面提到的《亢仓子》，就是个例子。亢仓子的名字虽见于古书，但以他的名字题名的那部书实在是出于唐代王士元之手。又如《种树书》的作者，显然不会是柳宗元所传的郭橐驼。据《明史·艺文志》，作者为俞

贞木。其人生当元末明初，晚年家居讲学，因参与反抗靖难之役被害。据推测可能是因为他政治上被视为叛逆，所以传其书者不敢显题其名，因为唐代柳宗元有一篇《种树郭橐驼传》，就假借来充作撰人。其实柳宗元的那篇文章不过是借题发挥，郭橐驼纵使实有其人，也绝不会著书立说的。再则书名的“种树”二字，应作栽种解；书中所记，包括各种农作物和园艺作物，并不是只限于树木的。这部书颇有内容，所以特别值得一提。也有的是虽然没有确证，但其为假作似无可疑。如旧题东方朔撰的《探春纪历》和崔寔撰的《农家谚》，应当并不真是汉代人的著作。特别是明代后期的一些文人，著述态度有欠严肃，往往剽取前人的书，改头换面，另题撰人，或作为自己的著作刊行，因而造成混乱的情况。举例来说。有一部书叫做《艺兰奥法》，各种刻本上撰人有的作赵时庚，有的作王贵学，而书的内容则与明末高濂的《种兰奥诀》几乎完全相同，只是文字稍有出入。赵、王二人都是南宋时人，也都写过兰谱，但在此以前并没有关于他们另有题材相同的著作的记载，因此这部书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谁，尚待考证。其他撰人需要考定的书也还不少，这也是利用旧农书时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再从时代的观点来分析一下历代的农书，可以发现一点，这就是不同时期的农业著述各有不同的重点。一般说来，五代以前绝大部分是属于纯粹农艺以及畜牧、兽医的方面，园艺性质的著作是很少的，而且也是以蔬菜为主。反之，宋、明两朝虽然也产生了颇有价值的农艺性质的书籍，如邢昺的《耒耜岁占》、陈旉的《农书》、马一龙的《农说》、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但园艺著作显然成了主流。各种专谱逐渐多了起来，而且绝大多数是各种花卉的谱，这种现象也许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农耕知识发达的早以及后来发展较缓的事实。正是因为许多主要知识和技术早已经有了，所以后来的创获不免相对地减少，从而文字的记录也就不如以前那样多，于是研究的锋头转向了园艺方面。在这同时，我们的封建社会已然逐渐走向腐朽阶段，一般知识分子多究心于尊生养性，以玩弄花草来消磨时光，这些东西也就成为著书的题材。这种作风到了明代的后期可说是达于最高峰，形成了所谓山人名士的风格，一般的是华而不实，竟为狂诞。因此，在读这些人的著作时，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警惕”的。举例来说。陈淏子的《花镜》一书，近来很受到专家们的重视，这部书虽说是清康熙年间写成的，但那时作者已是七旬以上的人，实在说起来，他的思想的形成还是在明代末期。从书的序言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也是属于所谓山人名士的类型的，因而他的著作当中，也就很可能是包含着浮夸的成分。这是同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不相合的。不过必须附带声明，《花镜》并不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我们举出它来，只是因为它已为人所注意，实在并绝没有轻视它的意思。这部书的内容还是十分丰富的。

我国历史上有几个时期是由来自北方的比较落后的部族作了统治者。经过侵入以前的长期战争和统治初期的残酷的掠夺，被统治区内农业生产一般地是遭受到很大的破坏。外来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地位，很快就认识到他们所征服的这个农业社会里主要的剥削对象应当是农民，因而也就接受了中国传统的重农原则。在这时期里，比较务实的知识分子看到农业的衰落，农民的贫困，也往往著书立说，讲求耕桑作业的道理，因此倒有很好的农书产生。著名的《齐民要术》就是这种时期的产物。元朝政府颁行的《农桑辑要》和王祜所著的《农书》，都是极有价值的。满清统治的前期也出了不少讲述农业技术的著作。例如关于耕作方法，特别是“区种法”，就有许多篇文章，虽然都很简短，但内容却颇为丰实。在统治者的直接指示之下，还编成了《广群芳谱》、《授时通考》等部头较大的、类书性质的农书。

我国旧有的农书虽说数量相当大，但完全保存到今天的已不甚多。印刷术发明以前时期的著作，绝大部分都已亡失。幸而由《齐民要术》这部书保留下来一些，虽然就篇幅来说是有限的，但通过《齐民要术》著者的精当的选择，可能所录存下来的正是那些原书中的精华部分。根据这些片断的文字，再加上其他各书所提供的资料，六朝以前时期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情况，大体上还是可以认识出来。唐代以后的农书，有许多也没有流传下来。其中像北宋邢昺的《耒耜岁占》，邓御夫的《农历》，明末徐光启的《农遗杂疏》，清初王夫之的《南窗外记》等，据当时人的记载，都是具有很高的价值的。又如明末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专门记述各种技艺的书，可是在国内绝迹将近3个世纪，直到二十几年之前，才借到日本所藏的孤本重刊行世。更有许多著作，篇幅不大，没有或很少有单行本，而是被编到了各种丛书里面，现在搜求起来也相当地费事。清代人著的书虽说距现在还不太远，但显然是由于当时原刊的数量过小，以后又未经重印，所以许多也是

不容易见到的。最后还要提到，地方志当中往往著录的有些与农业生产技术有关的书籍，但不见于一般藏书家的书目，可知其流传不广，大约只限于著者家乡一带的狭小区域。这种“地方性的”农书的作者，大都不是什么显赫人物，而是生活在农间的书生。正因为如此，书的内容可能是很切实的。例如近代陕西三原杨秀元的《农言著实》，据县志记载，书中所讲的，“老于农者或不能知”。像这一类的书，只有去到当地进行搜求，或许有到手的希望。

四、结语和建议

我国是一个农业古国，而且也无愧于是一个农业古国。我们确实拥有很多宝贵的有关农业生产的经验、特殊技术和丰富的文献。这一份可贵的民族遗产在今天大规模的国民经济建设当中应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们要在结合本国实际的认识之下来学习先进的农业科学，因此必须先根据先进农业科学的原理对本国原有的农业学术作一次彻底的整理，作出总结，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具体地学习和使用先进的方法。必须如此，学习才可能是真实的、有效的。

现在来进行这一工作，是有了良好的条件。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恢复了。政府已经作了明确的指示，并给以鼓励。人力和资料可以集中起来，按照一定的计划实行分工合作，工作效率是会高的。一般农民的政治觉悟不断地在提高，对于操作方法上的各种“窍门”，不会再是密不示人。我们所需要的只还有主观的努力。同时客观上农产品增产的迫切需要，也在后面推着我们必须尽快地完成总结遗产的工作，以便更有效地接受先进的农业科学来为新中国的农业生产服务。

所谓整理遗产，自然是抛弃糟粕，保留精华的意思。我们当然不应当走上另一歧途，穿凿附会，妄认现代的许多先进学说或技术我们古已有之。我们过去的东西再好，也只是经验知识。现在的问题在于把那些有价值的经验知识提高为科学知识。这是不消说的。

还有一点。现在进行这种整理工作，必须是具有现实意义，换言之就是要同农业生产实际联系起来。通过整理，我们不但要确定我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理论和技術上的各种成就，以及各种发现和发明的时代，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尽量发掘出现在仍然具有现实价值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加以研究与发挥，借助于现代的科学理论和技術条件予以提高。这也就是说，不应当是为整理而整理，一意钻到故纸堆中，忘却实际。有个日本学者讲，过去研究小学的人，辗转注释许慎的说文，结果搞了一套“许学”出来；研究地理学的人以酈道元的水经注为基础，发展成为一套“酈学”；以此为例，研究农学的人也应当对于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下一番注释疏证的工夫，抽出一套“贾学”出来。这种意见，实在是未见其可。对于一些古代农书加以注解，或许是必要的，但无论如何这不当成为整理工作的方向。

整理农业文献必须是同到农民中间进行采访配合起来进行，而且是应以后者为主。光是在文献上下工夫是绝对不够的。我国农民世代相传的很多极宝贵的生产经验和操作方法并未经文人记录下来，这是可以肯定的。如果经知识分子写在书本上的也许还不免有不尽切实之处，相反地，民间流传的生产法则和技術一定是完全基于实践，因而也就是更为真实，更具有现实价值。更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文物，也是这种整理工作当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近年各地出土的古物以及所被发现的前代绘画，当中颇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这些东西和保存在国内许多兄弟民族生活中的比较原始的器物和工作方法，都是研究我国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所有这些方面的搜聚、整理、研究工作，都要互相配合起来。也举一个例。山东嘉祥县和潍县都有小麦春冻碑，记载小麦经春霜，冻死后复活的事，时间是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而清人桂馥所著的《札朴》(书作于嘉庆初期)里面，也有同样的记事，大约就是同一年，地点是山东长山县。两下恰好可以互相参证。桂氏又举出《南齐书·武帝纪》载，永明四年(486)“临沂县麦不登，刈为马刍。至夏，更苗秀”。那可能也是类似的情形。有趣的是，不久以前，山西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详见1954年12月13日光明日报)。从这个例子来看，就可相信，如果在进行整理祖国农业遗产时，各方面的工作互相密切联系起来，是颇有可能帮助解决现实问题的。我们建议有关的领导方面考虑拟订全面工作计划，在统一的指导之下就各方面同时着手进行，分工合作，期能收到相当彻底的效果。

我国旧有的农学文献颇为分散，搜聚起来要花费很多的劳动和时间。因此建议

有关方面考虑选择旧有农书若干种，以及汇编过于分散而内容很好的有关文字，加以校对标点，以及必要的注释，作为中国旧有农学丛书重新刊行。这样会给读者以极大的方便。有了标点和注释，线装书是并不难读的。

顺带着提出来，有关方面可以考虑通过种种有效的方法在全国各地广泛地搜求较不经见的农书，特别是前面提到的那种“地方性的”著述。这在今天的条件下应当是没有多大困难的。

现在是开始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时候了。我们有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武器，加上上述各种有利的条件，一定可以胜利地完成这一任务。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1 2 3 4 5 6 7 8 9 10